

戈爾巴喬夫： 終結冷戰的革命家

●周陸洋

蘇聯末代領袖戈爾巴喬夫 (Mikhail S. Gorbachev, 1931-2022) 是備受爭議的歷史人物，論者的褒貶聚焦於他和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的關係。有人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誤入歧途的改革家、對經濟改革一籌莫展的木偶，也有人認為他是終結冷戰的英雄、嚮往自由化的蘇聯新人。這些評論從不同側面揭示了戈爾巴喬夫的政策後果和歷史遺產。本文提出一種新的評價：戈爾巴喬夫是革命和冷戰的產物，是深受蘇維埃思想影響、以激進手段終結冷戰的革命家。

戈爾巴喬夫生於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幼年成長於蘇聯體制日臻成熟的斯大林時期，其高等教育和職業發展則完成於冷戰年代。他對革命抱有浪漫化想像，崇尚激進的解決問題方式。由於兩極隔絕、對抗的氛圍，他對蘇聯和西方都一知半解，頭腦中充滿了蘇聯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在高估蘇聯國力的同時，對西方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形成歷史都不甚了了。他的改革因此兼具革命和冷戰色彩，一方

面能在短期內釋放自由、緩和大國對抗，另一方面也因為封閉條件下的認知局限，在經濟發展、國際關係和民族問題留下諸多隱患。

戈爾巴喬夫是折射過去與現在的稜鏡：看似對立的共產主義革命與西式自由化之間實際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享受着特殊信息渠道的精英一樣會被本國的政治正確規訓和蒙蔽；位高權重、自信能夠改變歷史的超級大國領袖，自身也是冷戰年代封閉和偏見的產物。

一 學術界對戈爾巴喬夫的既有評價

關於戈爾巴喬夫的既有評價主要有四種，從不同側面揭示了戈爾巴喬夫的個人性格、身處的結構情境和同代群體的特點。

第一種認定其為經驗不足、信仰淡漠、誤入歧途的改革家，是導致蘇聯共產黨垮掉的一代。這種評論指責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兼具革命和冷戰色彩。(資料圖片)

戈爾巴喬夫，認為他對西方讓步過度、丟失了蘇聯辛苦獲得的地緣政治空間^①，以及在國內改革中急於求成，造成並不必然發生的經濟崩潰和社會災難^②。近距離接觸過戈爾巴喬夫的批評者，往往將此歸咎於他的個人品性和工作作風，稱其好大喜功、愛慕虛榮、浮躁易怒^③。而更具社會學色彩的解釋認為，「戈爾巴喬夫現象」是整整一代蘇共高級幹部的集體病症，源於蘇聯「老人政治」突然終結後年輕領導晉升過快、缺乏政治經驗^④。

第二種評價較為正面也較為宏觀，肯定戈爾巴喬夫結束冷戰的歷史性貢獻^⑤。這一評價是西方學術界主流，也來自與戈爾巴喬夫本人有過合作的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夫人、里根(Ronald W. Reagan)和布什(George H. W. Bush)政府成員^⑥。持有比較歷史視角的學者甚至認為，蘇聯這樣的多民族帝國能夠和平解體，在近代歷史上實屬罕見。如果沒有領導者的執著、睿智和決斷，蘇聯解體完全可能引發奧匈帝國、德意志帝國崩潰時的災難性後果^⑦。

第三種理解同樣較為正面：戈爾巴喬夫成長於極權政體之下，卻有着難能可貴的自由主義心智。這種觀點認為，戈爾巴喬夫的世界觀和知識儲備形成於去斯大林化的「解凍」時期。受惠於這一時期較為寬鬆的知識氛圍和政治環境，這一代蘇聯知識份子對西方文明有一定的正面接觸，在步入中年、執掌最高權力後則積極推動蘇聯變革，實現年輕時寄望的「人道社會主義」理想^⑧。這種觀點強調戈爾巴喬夫的能動性和自覺性，因而與左翼的「叛徒論」指責在事實描述層面頗有暗合。

第四種評價來自經濟學家，他們認為戈爾巴喬夫只是歷史結構的木偶，既沒有卡里斯馬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也沒有官宦世家背景，是一位憑藉良好教育、邊疆背景和貴人指點而平步青雲的寒門子弟。面對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他和許多同僚一樣一籌莫展，只能在僵化派和市場派之間搖擺，甚至將經濟議題邊緣化或擱置^⑨。面對蘇聯官僚盜竊國有資產的狂潮，他也一樣無能為力，不知不覺走上顛覆蘇聯的道路，留下一個寡頭橫行、犯罪猖獗的經濟亂世^⑩。

二 革命和冷戰對戈爾巴喬夫的影響

本文從革命和冷戰視角出發，提供一幅更具縱深感的肖像。與蘇共先前的領導人相比，戈爾巴喬夫有兩個特點。他是第一位(也是唯一)出生在十月革命以後的蘇聯總書記。這一點不同於年長一輩的蘇共領袖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安德羅波夫(Yuri V. Andropov)以及契爾年科

(Konstantin U. Chernenko)。勃列日涅夫等人成年才是蘇聯時期，但俄國尚在新經濟政策的不確定階段。而戈爾巴喬夫出生於斯大林體制成形期，此時蘇聯官方已經形成了一套關於十月革命、列寧和蘇共黨史的成熟敘事。如果說先前的蘇共領袖都是沙俄人或蘇俄人，那麼只有戈爾巴喬夫是政治社會化意義上的「蘇維埃人」。他也是唯一受過完整正規高等教育的蘇聯最高領袖，因此不同於那些通過大學自修課程、神學院、工業技術學校、航運學校和黨校取得文憑的前任領袖。這一點為許多傳記文獻強調，認為是他仰慕自由化的根源。但需要指出的是，戈爾巴喬夫完成高等教育並在職業上快速上升的階段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此前蘇聯還通過大蕭條時期簽訂技術援助協議、秘密條約和戰時合作，與西方保持緊密的經濟技術接觸，而在他成長的年代，蘇聯已經陷入與西方隔絕和對抗的狀態。儘管他從政早期就有多次訪問西方的經歷，但這並不改變冷戰封鎖之下信息匱乏和扭曲的基本格局。總之，在蘇聯所有領袖中，只有戈爾巴喬夫同時具備「蘇維埃人」和「冷戰人」特點。

戈爾巴喬夫對革命的理解完全來自斯大林時代精心過濾的宣傳話語。這種話語把俄國革命描繪成決絕堅定的史詩進程，是少數英雄人物一揮而就的宏偉歷史行動——革命完成之際，俄國就已建成社會主義。至於革命進程中的妥協和交易，以及革命成功的背景條件，則在宣傳話語中語焉不詳。蘇聯體制當然不是當時唯一的政治社會化載體，但蘇聯體制教授的思維習慣和政治技巧卻是「蘇維埃人」最熟練也最舒適的。這就不奇怪為何

戈爾巴喬夫執政初期的言行經常和革命歷史有關，比如「向列寧求教」、「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以及膜拜布哈林(Nikolai I. Bukharin)等早期領袖的造神運動。當然，革命思維對戈爾巴喬夫的影響遠不止於此。在改革進入否定蘇共的激進階段後，其對革命思維的繼承反而變得更為深刻。他相信政權改變和人事更迭的作用，在經濟「加速發展戰略」遇挫後，他轉向頻繁的政治制度改造，撤銷了許多重要機構。他也繼承了蘇共政治哲學中根深蒂固的古典啟蒙思想，相信最好的價值可以兼容並蓄；他所期待的改革既要有效率又不能造成失業，既要有競爭又不能有輸家。他也擁有革命者對速度的迷戀，作為改革口號的「重建」(Perestroika)就有在短期內完成系統性改變的含義——只要找準命門，就能讓社會立刻走上康莊大道。

結束冷戰是戈爾巴喬夫最無爭議的歷史功績，他也因此被讚譽為熟悉西方的人。然而，戈爾巴喬夫對西方文明的理解有着那個時代典型的偏差：他不了解工業資本主義和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形成過程，尤其不了解權力、權威、強制和暴力在其中的關鍵作用；他把西方文明想像成推倒專制、人民群眾熱烈擁抱後即能熟練使用的工具，卻不理解西方體制內部同樣需要制約、平衡和監管。這種認知局限是冷戰年代相互封鎖的後果，美蘇交往長期限制在精英層面，既沒有數量龐大的留學生和僑居人士，也沒有外資企業和管理合作，缺少密集、全方位的信息流動。一些觀察偏差、錯誤印象一旦在精英層面形成，就會被權力加強，進而誤導決策。比如，和冷戰時代的蘇聯知識份子一樣，戈爾巴喬夫對市場化的負面結果缺乏心

理準備；訪問歐美的蘇聯精英只看到當地社會的繁榮和效率，卻不明白它們背後的勞資關係、保障制度千差萬別，許多工作倫理是長年在社會主義福利體制下生活的蘇聯公民不願承受的。戈爾巴喬夫對民主的理解也十分幼稚，他認為民主化之後少數民族問題會自然解決——這樣的認知顯然更像是十月革命前列寧民族理論的翻版，反映了蘇聯政界、學界精英對西方族群關係、民族國家形成歷史的無知。

戈爾巴喬夫對西方作出重大地緣政治讓步，這一點恰恰反映了他思維中的布爾什維克遺迹。國內改革遭遇重重困難、無法打開局面，他把重心轉移到外部，試圖利用蘇聯的權力解放核戰爭陰影與集權制度壓迫下的歐洲。他希望以此發出有力度的信號，證明蘇聯是誠心融入西方文明的，希望以此換來西方對蘇聯的真誠援助，從而推動蘇聯成為文明國家。許多早期社會主義者抱有相似的想法，比如拉狄克(Karl Radek)、柯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普列漢諾夫(Georgi V. Plekhanov)，甚至列寧本人。對這些社會主義者來說，落後的俄國即使成為第一個爆發革命的國家，也只有在歐洲革命的庇護下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目標，否則只會墮入從反叛走向專制的惡性歷史循環。

當然，戈爾巴喬夫是複雜的，他對俄國的批判心理遠不如早期布爾什維克那樣深刻。列寧對於俄國的落後始終保持着高度警惕。他希望革命中心盡快轉移回歐洲，並在這一目標失敗後力排眾議建立聯盟結構的蘇聯，以便壓制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斯大林雖然恢復了許多俄國傳統文化符號，

但在行動中仍然着力改變蘇聯落後的勞動和生活習慣。戈爾巴喬夫對蘇聯社會遠沒有這樣深刻的認知。他對蘇聯的成就感到驕傲，認為蘇聯體制並沒有根本性問題，只是「老人政治」、紀律鬆弛導致到處無人管理。基於這樣的認識，他在執政初期把重心放在人事調整和宣傳鼓動上，認為只要形成一個全民亢奮的建設熱潮，蘇聯體制的巨大威力就能重新煥發。

三 戈爾巴喬夫的歷史地位和遺產

不同於學界的四種既有評價，本文認為戈爾巴喬夫雖然是一位終結冷戰的革命家，但他對西方文明的了解有限、崇拜多於認識，而他對俄國革命和蘇聯體制的繼承性卻被大大低估；他並非重重結構壓力下毫無能動性的木偶，但他的能動性被蘇聯體制和冷戰對抗規訓，他的改革是在長期封閉條件下發動的革命。戈爾巴喬夫（以及同代蘇聯精英）是兩個基本歷史情境的產物：蘇聯建國將近七十年，蘇聯體制下培養的「蘇維埃人」取得最高權力；二戰後蘇聯走上與西方對抗道路，冷戰格局下形成了長期自我孤立和意識形態誇大的認知天花板。基於這樣的認識，筆者不認為蘇聯解體應完全歸因於戈爾巴喬夫（蘇聯衰落有太多結構性因素），也不企圖為1980年代的蘇聯指明一條並未發生（或許根本不可能發生）的正確道路，更不否定和批判戈爾巴喬夫的正面價值。戈爾巴喬夫就像被按了暫停鍵的啟蒙運動者，他的許多訴求依然飽含着啟蒙理想，比如攜手應對人類共同挑戰的大國關係、民主制度下的民族

和諧、自由體制下人的尊嚴和創造力。這些價值正在變得日漸珍貴。

評估戈爾巴喬夫的歷史遺產遠比解讀他的個人背景困難。在俄國之外，他留下一個失焦的世界。戰勝了蘇聯的美國未必感到愜意，對美國而言，蘇聯是一個直接而清晰的對手，它對美國價值觀的威脅顯而易見，與美國又沒有深度的經濟糾葛；與蘇聯對抗暫時擱置了美國在自身國際定位上的迷惘。這個對手瓦解後，美國開始迷失方向，在退回孤立主義和領導世界民主化之間搖擺。戈爾巴喬夫也留下一個迷惘的俄國。1990年代俄國陷入巨大動盪，以致人們產生了俄國不再需要劇烈變化的心理。這種渴望休息、拒絕折騰的共識，成為普京(Vladimir Putin)能夠長期執政的基礎。戈爾巴喬夫對中國的影響或許是最複雜的。一方面，他改善了中蘇關係，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寶貴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他也長期被描繪成中國改革的反面教材。1980年代的中國並非沒有面臨蘇聯的困境，但是中國並未選擇革命，而是通過發展經濟，漸進地了解西方、破除意識形態中的政治正確迷思——在這一層面上，戈爾巴喬夫的確充當了中國的反面教材。但是，他的成長背景告訴我們，他的錯誤來自長時段大縱深的歷史脈動，因此並不那麼容易規避。

註釋

① 有俄國學者認為，冷戰是一個綿延到蘇聯解體之後的連續過程，美國反覆要求蘇聯—俄國作出令人信服的行動，證明自己對美國秩序的尊重，而戈爾巴喬夫配合這一互動模式。此觀點可參見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教科書：Татьяна

А. Шаклеина, *Россия и США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Moscow: Aspekt Press, 2017), 180-88。

② 參見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4, *Globalizations, 1945-201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91-98。

③ 這種觀點可參見博爾金 (Valery I. Boldin) 著，李永全等譯：《戈爾巴喬夫沉浮錄》(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

④ Дегтярев А. Якимович,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причин распада СССР – актуальная задача нашей наук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issue 6 (2021): 36-39.

⑤ 參見 Vladislav M. Zubok, *Collaps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⑥ 關於西方政要對戈爾巴喬夫的正面評價，參見 Archie Brown, *The Human Factor: Gorbachev, Reagan, and Thatcher,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⑦ John A. Hall,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Civil: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Decen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198-200.

⑧ Robert English, *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Gorbachev, Intellectual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154-55.

⑨ 參見 Chris Miller, *The Struggle to Save the Soviet Economy: Mikhail Gorbachev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6)。

⑩ 參見 David M. Kotz with Fred Weir, *Revolution from Above: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